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in China

邬文玲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in China

郭文玲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李均明, 刘国忠, 邬文玲, 刘光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161-0015-8

I. ①当… II. ①李…②刘…③邬…④刘… III. ①竹简 - 研究 - 中国②帛书 - 研究 - 中国 IV. ①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095 号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邬文玲等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 任 编 辑 黄燕生

特 邀 编 辑 立 早

责 任 校 对 林福国

封 面 设 计 郭蕾蕾

技 术 编 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39570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2.75

字 数 718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版 8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



图版 9 清华简研究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合影（从左至右为廖名春、李均明、沈建华、李学勤、赵剑英、黄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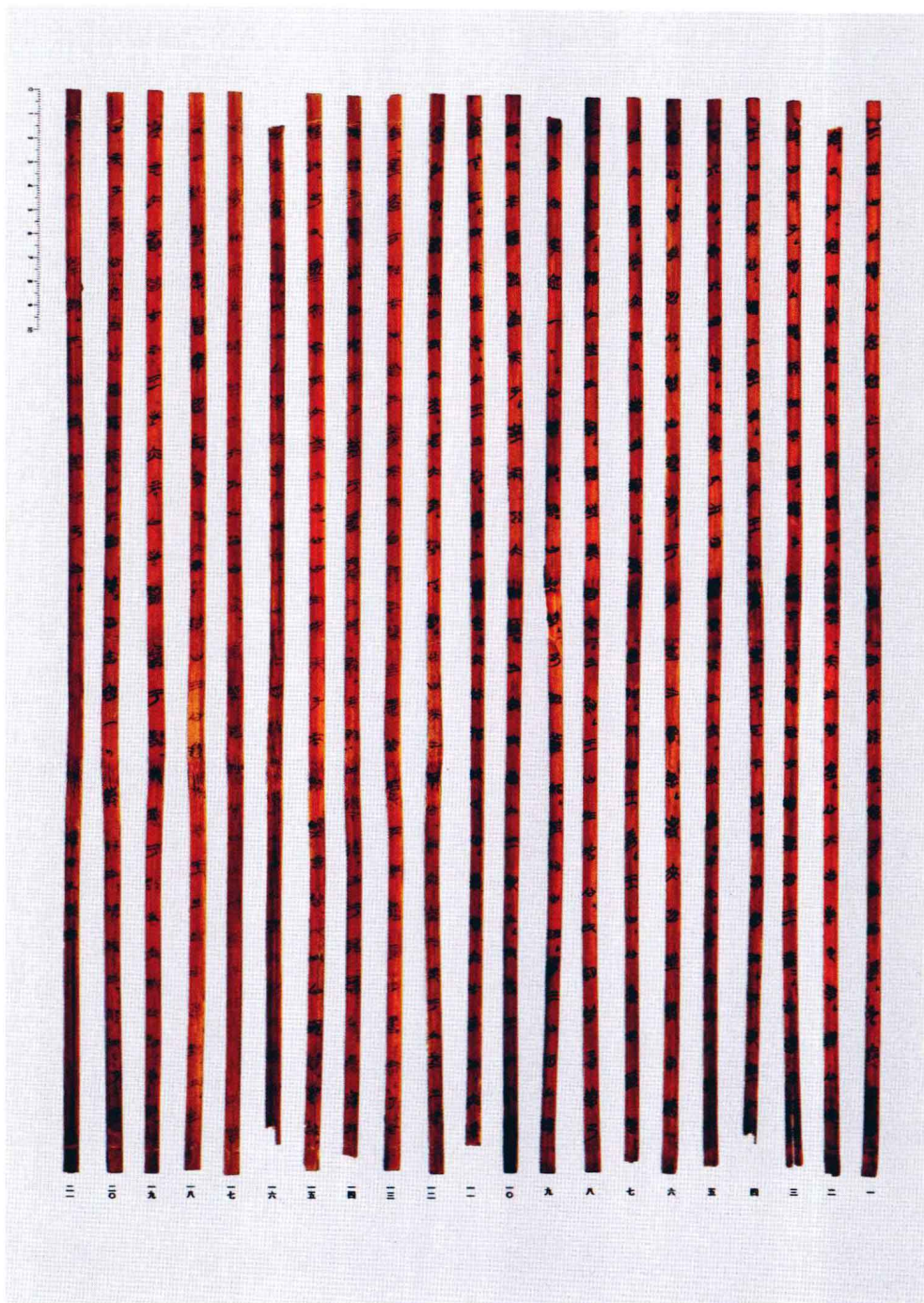
图版 7 金关汉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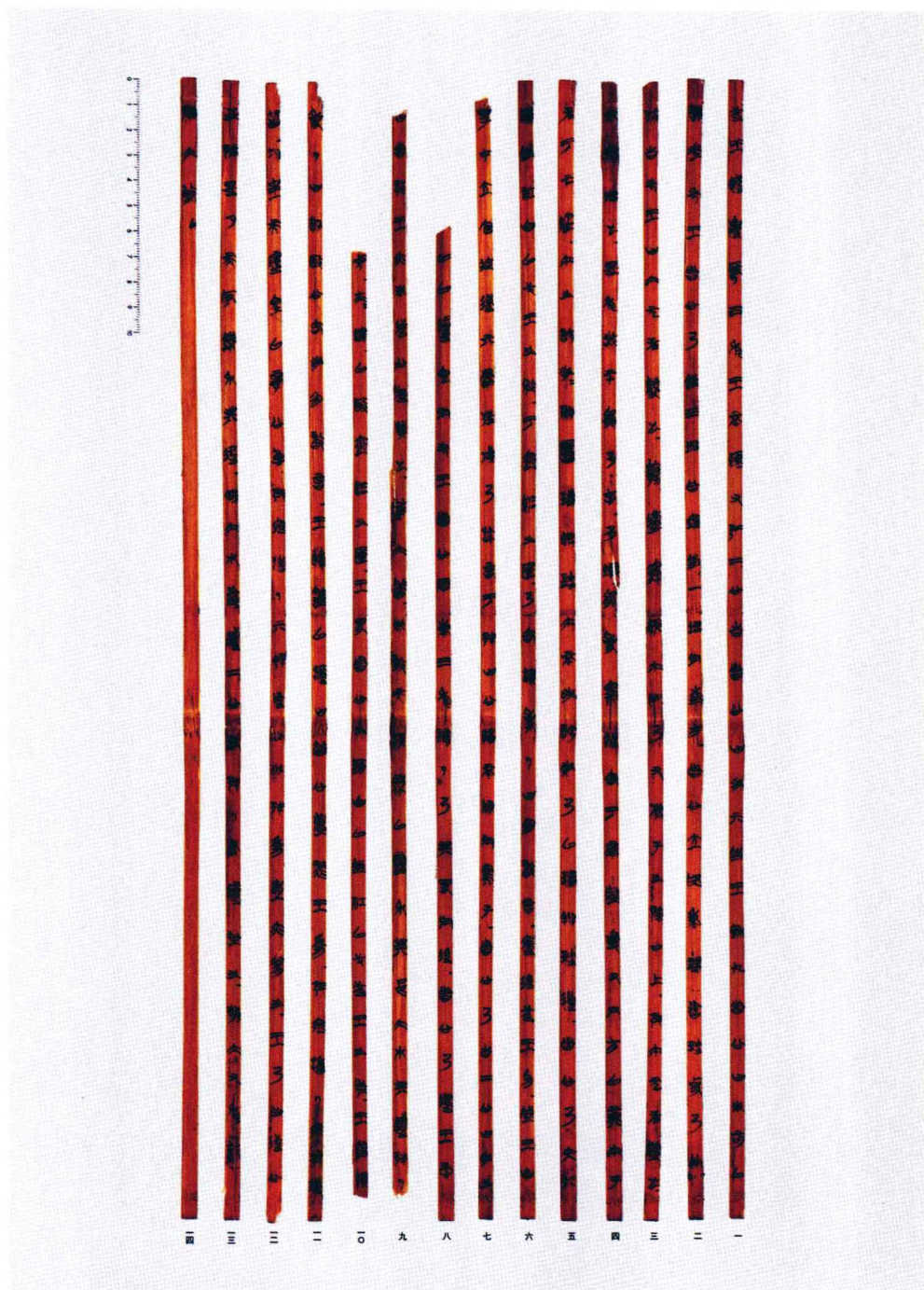
图版 6 尹湾汉简名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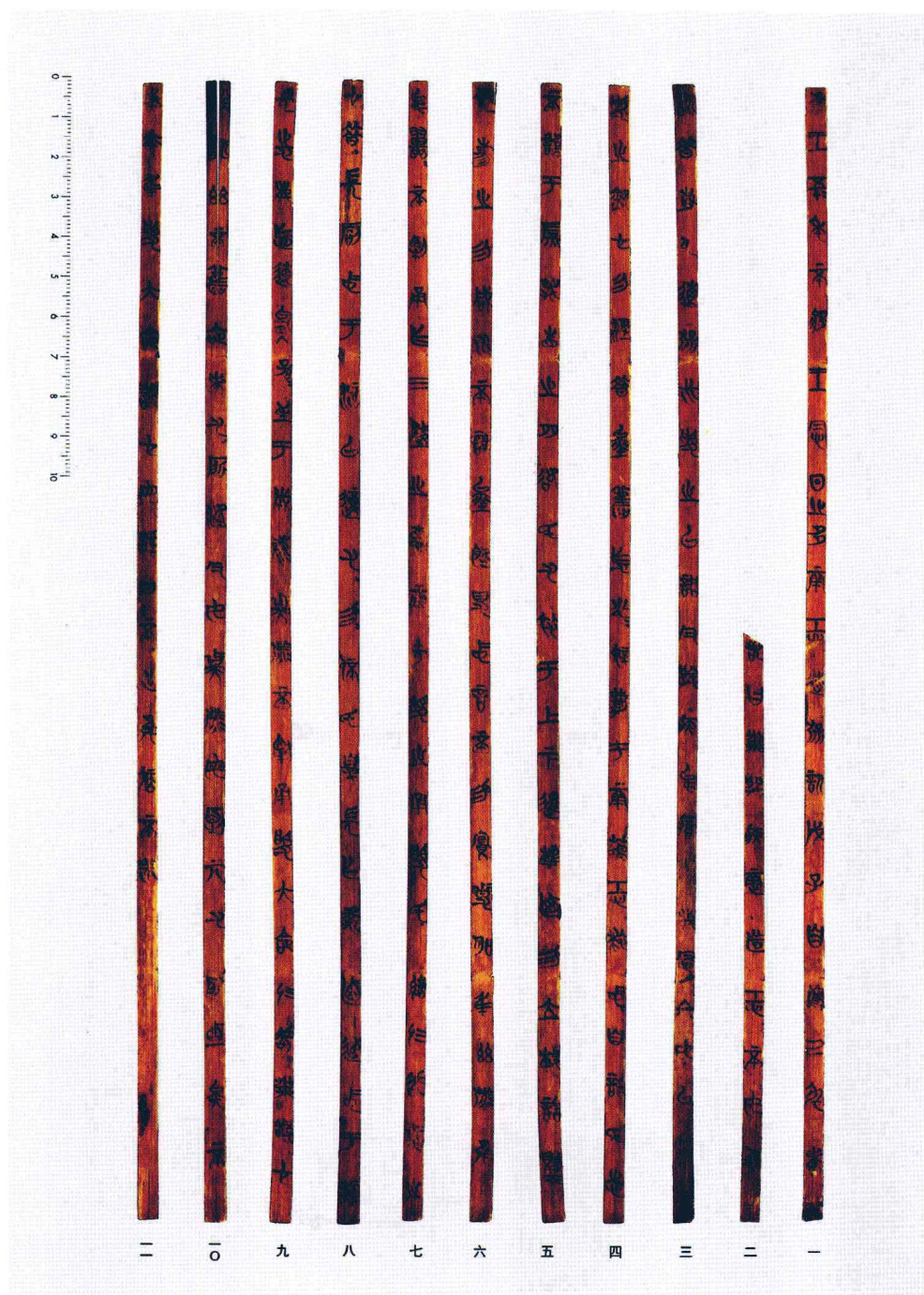
图版 4 居延汉简《大将军莫府书》册（部分）



图版3 清华简《祭公》正面



图版2 清华简《金滕》正面



图版 1 清华简《保训》正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和刘国忠教授等新近撰写的这部《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向广大读者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简帛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轨迹和丰富内容。

简帛学是 20 世纪创建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门重要学科。正如大家所知，竹木制的简牍与丝质的缣帛，是中国人于发明纸以前使用的书写载体，其广泛存在的时间约两千年之久，其在历史文化上关系之重大可想而知，因此简帛学是关注中国文明传统的人们必须了解的。

现代学术界重见古代的这类文物，正好是在 20 世纪刚刚揭幕的时候。随后种种发现越来越多，考察研究也渐趋深入，对于简帛的性质、材料、形制、用途及其内涵种类、文字体例等方面的知识，得到逐步积累。对古代简牍帛书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契机，就渐渐成熟了。

纵观简帛学兴起演进的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初西部地区汉晋木简的发现，最早的事例为斯坦因 1901 年在新疆尼雅的获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及他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的重心，是 1930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掘获的居延木简和劳榦先生等对之进行的整理考释。由于这批简牍远比其前的发现丰富，所以在历史、考古学领域造就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第三阶段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铺开，多批简帛陆续发现，无论是时代跨度，还是数量和内容，都远远超越了过去。简帛的保护与整理成为十分紧迫的学术课题，因而简帛的研究和许多学科建立起了联系。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专业性的整理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在高校和研究生教育里，有关研究也成为培养方向。

进入崭新的 21 世纪以来，简帛学的进展尤觉迅速。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这个学科的进步表现为学科的细化。

2 序

许多学者业已认识到，细化是简帛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明确表现事实上，历年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依其本身性质，可划分为典籍和文书两大类，对两者进行整理研究的方法途径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异，所需要的知识手段也互不相同，应该作为两个学科分支看待。以往在有关资料较少的时候，同一位学者对典籍、文书两者尚能统观兼顾。如今发现层出不穷，想一概深入研究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具体的例子，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楚文字书写的典籍，里耶简、长沙简等秦汉三国时的文书簿册，任何一项的编排考释都需要专业人员深厚的积累，长期的工夫。很明显，把简帛学划分为简帛书籍、简牍文书两个学科分支，不仅是发展趋向，而且还是当前的实际了。

李均明、刘国忠等的这部《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与其他类似的概述性书籍的不同，正在于将简帛典籍和简牍文书分开来论说，书中为了方便读者，先讲简牍典籍，再谈简牍文书，而以帛书殿后，眉目非常清楚。读者很容易看到，简帛学是怎样起源和形成，又如何走到今天，细化为简帛典籍和文书这两个学科分支的。我们不妨以这部书的出版，作为简帛学进一步细化的标志。

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总是不断细化的，但细化越繁，各个分支的交叉关系就越强，换句话说即越需要互相关联和结合。希望《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的读者，先纵观简帛学领域的全体，再深入了解各个分支乃至诸项发现，对于这门学科一定会有较全面的认识。

李学勤

2011年1月14日

前 言

简帛泛指简牍与帛书，来源甚早，郭沫若先生说：“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①李学勤先生肯定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说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联成册^②。《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备物典策”，典策即典与册，甲骨文、金文中“册”、“典”、“聿”等字的出现，证明殷周时期已有典册存在，但李先生只是强调简牍出现较早，而全冠军则进一步推衍为简牍的出现不晚于甲骨^③。

王国维说：“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先后。”^④甲骨、简牍产生的先后顺序，目前尚不能确定。现在发现的最早简牍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属战国初期，邢千里先生推定简牍晚于甲骨的关键性证据是春秋以前墓葬中从未发现简牍。我们虽从未从墓葬或其他遗址中发现商代或西周时期的简册，但笔墨的出现足以佐证简牍已被应用的可能，在殷墟或更早出土的文物中，已发现书写工具的存在，如河南仰韶和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用毛笔描绘的花纹和符号^⑤；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灰坑 H3403 出土一扁壶，上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② 裘锡圭先生也肯定殷商时期简牍的存在，他说：“简至迟在商初就已使用。”参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3页。

③ 全冠军：《论简牍不晚于甲骨出现》，《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2期。

④ 王国维撰，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⑤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1—97页。

2 前言

有毛笔书写的“文”字，距今四千多年，时代至迟在夏代前期^①；殷墟有以毛笔书写而未契刻的甲骨^②，郑州西北小双桥遗址有毛笔书写的文字出现^③，安阳铁西区刘家庄南地的商代墓葬出土玉石璋 44 片，有朱书字迹者 28 片^④；西周出土器物上也有毛笔书写的文字，1964 年洛阳北窑西周墓 M37 的铜簋内壁、M139 的戈上、M172 的 5 枚铅戈上，都有墨迹存在^⑤；1990 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 M9 发现有墨写文字的玉片，距今最少有 2600 多年^⑥。砚是用来作为承载书写颜料的，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砚是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其中有带着盖的石砚与砚棒，石砚有臼窝，窝内还残留着红色颜料，砚边有黑红色石墨^⑦。我们知道，简牍上的文字是用笔、墨书写的，而这些笔、墨、砚台等书写工具在殷周乃至更早时期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春秋以前简牍已经出现的可能性。

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比甲骨、金石容易取材，制作也更为简便，因此简牍逐渐取代甲骨、金石，占据书写材料的主导地位有其必然性。只是竹木容易腐烂，或为春秋以前简牍不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或问今后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按今已发现简册之成熟精致程度而言，出土战国以前简牍的可能性极大。

我国历代既有简牍出土，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汉武帝末孔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对其存在多数学者持肯定意见，由此引起今古文之争；二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出土的“汲冢书”，亦为战国简，存大量典籍。但上述简牍资料皆未能完美传世，今仅见少量辑本。其他各代出土之简牍，则仅见零星记载，数量很少。

-
- ① 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 年第 1 期。
 - ② 参看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开明书店 1933 年版，第 417—418 页；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 年第 6 期。
 -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 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 年第 3 期。
 - ④ 除玉璋残片外，据陈志达先生统计，商代玉石文有 20 多件，其中约 23 件为刻文，2 件为毛笔书写。参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第 3 期；陈志达：《商代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 年第 2 期。
 - ⑤ 蔡运章：《洛阳北窑西周墓墨书文字略论》，《文物》1994 年第 7 期。
 - ⑥ 师安衷：《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发现》，王斌主编：《虢国基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时代（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0—253 页。
 - ⑦ 西安半坡村博物馆等著：《姜寨》，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9—200 页。

20 世纪尤其近 30 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腾飞,土石的大量开挖,古代简牍也显露地面,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乃此前二千年之总和所未及。1900 年前后,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甘肃等地探险过程中,挖掘了不少的汉晋简牍,揭开了我国近代简牍整理与研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发现的简牍总量约三十万枚,出土地点分布于甘肃、青海、内蒙、新疆、四川、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多个省区^①,其内容也已远超出《汉书·艺文志》的辑录范围。1925 年王国维称他所处的时代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可称为“大发现的年代”,从居延汉简到里耶秦简,从郭店楚简到三国吴简,由于它们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传抄而保留了古代典籍及文书的原貌,使尘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新再现,简牍的研究价值得到凸显,成为通往历史世界不可或缺的时空纽带。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 简牍文书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尤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简牍文献的出土,揭开了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序幕,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进程,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者的极大关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作为当今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国际性“显学”,简牍学将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结合起来,成为 21 世纪中国早期文明取得创新与突破的关键所在。人们对简牍自身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固然可区分出简牍与帛书。而随着简牍数量之遽增、内容之充实,人们对简牍自身的特点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又可从中划分出简牍典籍与简牍文书两大类。由于功能不同,简牍典籍与简牍文书在形式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李学勤先生认为“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文书是指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③。形式较整齐。文书是各级行政当局在行政运作、经济活动及个人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记录,例如,律令,司法文书,上行、平行、下行文书,经济账簿,人员名册,各式契券、合同,私人信件,会盟祷辞,祭祀记录等,具有特定的实效性,形式较

①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资料综述》,《古汉语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②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 页。

③ 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文物》1999 年第 10 期。